

古代的女子真的是足不出户吗？



《魏国夫人游春图》展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贵妇出行时的风貌 资料图片

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物资极度贫乏，平民家庭里光靠男性劳作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因此，家中妻女必须参与各类生产活动，不可能终日足不出户。能让家中女性成员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越”，往往都是相当富有的上层阶级，但也远没有后世想象中那么夸张。

唐代贵妇出行场面壮观

历代女性出行，犹以唐代贵妇出行的场面最为壮观。杜甫在其名作《雨人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唐初时，贵妇出行往往要披带遮掩，不能以面示人。

但到开元年间，风气渐渐开放。从驾的骑马宫娥头戴胡帽，靓妆露面，民间不论士人庶民，都争相模仿。甚至还有有的女性骑马时露髻驰骋，或干脆身着男装。在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对女性出行已没有多少束缚。

宋代妇女出行装束封闭

至宋代时，女性出游仍很普遍。南宋《武林旧事》载：“六月六日，是显应观崔府君（古代神仙名）的生日。早在北宋东京时，相关的祭祀就已经很繁盛

了。当天，都市男女先聚集在一起烧香，之后不久泛舟湖上，游玩避暑。”又如《岁时广记》载：“过去蜀地的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市男女，络绎不绝地前往郊外游赏，在橘红色的帷幕下唱歌饮酒。”从中不难看出宋代女子出游时的盛况。

虽然宋代也有像司马光这种极度保守的士大夫，在其《居家杂仪》中要求“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关于司马温公不许夫人在上元节外出看灯的轶事，亦流传颇广。但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保守派，本就有迂腐的名声在外，无法代表当时的社会风气。

不过，宋代的社会风气，较之于唐代确实已趋于保守。相比唐代，宋代贵妇出行时的装束变得封闭而笨重。她们往往头戴帷幕等遮掩物，不使外人窥见其容颜，在室内才能脱去。

明清女性出行受到限制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理学兴盛，大户人家的女性出行受到显著限制。在一些家规中，即使是庙会、元宵等场合，轻易也不准她们参与。平时会客只能和亲人相见，若有陌生人造访，更不许

抛头露面。不过这些限制也仅存于部分大户人家，不能作为明清时期妇女出行状况的普遍代表。

晚明时《采馆清课》就记载：“杭州城的男女，在花开时游玩西湖，列舰排云，斜风而渡，遇到酒客都不回避，游玩时颇具胆量。”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于《陶庵梦忆》中提到出游时写道：“柳湾桃坞，痴迷仁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说明当时有些女子，出游的目的就是为了邂逅浪漫。

除了游山玩水外，节日庆典和宗教朝圣也都是当时女性集中外出的重要理由。

然而，明清两代的官方可就不像唐宋时期那么开明了。早在明代，江苏地方官府就曾禁止妇女游山。清代类似的禁令更是层出不穷。保守士大夫们禁止女性出游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她们有违妇道，可能在游玩期间行淫乱之事。不论是善男信女烧香礼佛，还是节日庆典街头行走，都是男女混杂于一处，有伤风化。

但这些禁令和非议越多，反而越说明道学先生们“整肃民风”的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

来源：北方时报

赵朴初

“不念”兄弟情

1949年，赵朴初一家人从安庆搬到上海生活。有人给赵朴初的弟弟赵曙初介绍了一份去上海私立南翔静安乡实验小学教书的工作。赵曙初觉得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在乡村小学当教师是大材小用。

一次，赵曙初在批改一名学生的作文时，用笔在学生的作文本上乱勾乱画，最后，他连作文评语也没有写，便扔下笔跑到郊外去闲逛。很快，这件事传到赵朴初那里，他立即赶到弟弟的学校，当着众多教师的面，硬是将弟弟批评得抬不起头来，同时命令他向写那篇作文的同学道歉认错。

几天后，赵朴初还是决定将弟弟送回老家，让其自谋职业

来源：人民政协报

钱学森

不爱钱的故事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月工资350元。后来他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增加补贴10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高薪了。

1962年，中央号召干部减薪。当时钱学森的日常工作已转到了航天领域，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说减薪的事，便主动给力学所党总支写信要求给自己减薪，从每月450元减至331.5元。从那以后，钱学森的工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时都没有变过。

在工资收入之外，钱学森还有些稿费收入，但他总是捐出去。1957年初，钱学森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当时他响应政府号召，用此款买了国家公债，公债到期，连本带息总共1.15万元。1961年12月，钱学森把这笔钱捐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

凡是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己的稿费让给合作者。他常对合作者说：“我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在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著书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全部让给了合作者。

1995年，钱学森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何梁何利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这笔巨款支票汇到后，他看都没看就写了委托书，授权秘书把钱转交给促进沙漠产业发展基金管委会，支援我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他曾说：“我作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来源：解放军报

“人民子弟兵”称谓的由来

“子弟兵”一词，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亲切称呼，这个称呼出自聂荣臻当年领导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3000人的武装，在晋（山西）、察（当时的察哈尔省）、冀（河北）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时在晋察冀地区，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1939年5月，聂荣臻发布通令，嘉勉平山团作战英

勇，屡立战功，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这是“子弟兵”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

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冬季反“扫荡”战役取得胜利，社会各界发来大量祝贺函电，盛赞聂荣臻将军指挥有方，屡建奇功。聂荣臻在《抗敌报》上复信指出，晋察冀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是“全边区父老和子弟兵的血肉所创造出来的”。晋察冀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也改名为《子弟兵》。就

这样，“子弟兵”这个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

李公朴在1940年春到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大字，成为人民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亲切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来源：党史文苑